

# 试析 郭士立 在华传教活动中的 身份建构与身份冲突<sup>\*</sup>

胡 凯 张翰轶

**摘 要：**在近代来华的众多传教士中，郭士立是最受争议的一位。他对在华传教事业贡献颇多，却受到同时代其他传教士的指责。他是勤勉的福音传播者，却也是积极协助殖民国家侵略中国的帮凶。本文尝试从身份建构和身份冲突的视角出发，对郭士立的在华传教活动进行分析与评价。

**关 键 词：**郭士立； 传教士； 身份建构； 身份冲突

**作者简介：**上海外国语大学 德语系 教授 博士 上海 200083

上海外国语大学 德语系 硕士研究生 上海 200083

**中图分类号：**K835.165.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 - 4871(2017)02 - 0097 - 13

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是第一位来华的德籍路德宗传教士。他孑然一身前往中国，将毕生精力投入到了在华传教工作中。他是传教士，是外交

---

<sup>\*</sup> 本文为2016年中德合作科研项目(PPP)资助课题“新教在华传教研究——以柏林传教会为代表”(录取文号留金欧[2017]6052号)的阶段性成果。

家,也是语言天才和汉学家。他行医送药,办学办报。然而在对华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中,异常活跃的郭士立也是殖民侵略者阵营中的重要成员。郭士立复杂、多元且不无内在矛盾的身份与行为令其饱受争议,也使其成为近代来华传教士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

### 一、郭士立研究与建构主义身份理论

1803年,郭士立出生在普鲁士东部波美拉尼亚的皮里茨(Pyritz)。1820年,他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访问斯特丁(今什切青)时献诗并得到国王对其学业的资助。1821年,郭士立进入柏林仁涅克神学院,后又加入荷兰传道会接受传教训练。1827年,郭士立来到东南亚传教。次年,他脱离荷兰传道会成为独立传教士。从1831年起,郭士立主要在中国活动,通过各种方式拓展基督教影响并借助笔耕译介沟通中西文化,引起了西方各界的兴趣与关注。郭士立积极参与中英鸦片战争,曾先后受雇于英国商行和香港殖民当局,后又创立福汉会向中国内地传播基督教。1849年到1850年,郭士立在欧洲奔走,鼓吹来华传教,并为福汉会宣传造势。郭士立重返柏林引起了轰动,为他举办的欢迎会吸引了柏林科学和艺术界的所有名流。期间,他怂恿母国普鲁士来华攫取贸易及政治特权,但因当时普鲁士海外扩张的条件尚不成熟而未得到采纳。<sup>①</sup>然而,郭士立的宣传与普鲁士及德意志传教会(如巴陵会、巴色会和巴勉会等)来华传教的决定有直接关系。“柏林中国传教总协会”(小巴陵会)和“柏林中国传教妇女协会”(巴陵女书会)也是在他的影响下于1850年成立并在其后向中国派遣传教士的。<sup>②</sup>

作为新教在华传教史上的重要人物和德国新教在华传教事业的开路先锋,郭士立颇受中德两国学界关注。其中,德国学界首重郭士立对新教——尤其是德国新教传教会——在华传教事业的影响与贡献,如德国最著名的郭士立研究学者赫尔曼·施利特尔的《在华传教士卡尔·郭士立》<sup>③</sup>和《在华传教士卡尔·郭士立和他的母国基础》<sup>④</sup>,以及哈特穆特·沃尔拉文的《卡尔·弗里德里希·诺依曼(1793-1870)

<sup>①</sup> „Vizekonsul Staegemann, Hamburg, an Ministerium der Auswärtigen Angelegenheiten“, 29. 8. 1850. v. d. Heydt an Ministerium der Auswärtigen Angelegenheiten, 4. 12. 1850, in Helmut Stoecker, *Deutschland und China im 19. Jahrhundert — Das Eindringen des deutschen Kapitalismus*, Berlin: Rütten & Loening, 1958, S. 43.

<sup>②</sup> 参见孙立新:《从中西文化关系角度看19世纪德国新教的中国传教》,载《文史哲》,2003年第5期,第40-47页,这里第41页。

<sup>③</sup> Herman Schlyter, *Karl Gützlaff als Missionar in China*, Lund: Gleerup, 1946.

<sup>④</sup> Herman Schlyter, *Der China-Missionar Karl Gützlaff und seine Heimatbasis: Studien über das Interesse des Abendlandes an der Mission des China-Pioniers Karl Gützlaff und über seinen Einsatz als Missionserwecker*, Lund: Gleerup, 1976.

和卡尔·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郭士立(1803-1851):两位19世纪德国的中国通》<sup>①</sup>等论著,对郭氏在华传教活动进行了传记式整理与分析。此外,也有从跨文化视角解读郭氏在东亚地区活动的成果,如托拉夫·克莱恩和莱因哈特·策尔纳出版的论文集《卡尔·郭士立(1803-1851)和东亚基督教:文化间的传教士》<sup>②</sup>等。相比之下,国内学界虽不乏专题研究郭士立传教行为的成果<sup>③</sup>,但中国学者的选题旨趣似乎更多地集中于郭士立除传教士以外的其他身份及活动,如基于殖民主义研究范式对其襄助鸦片贸易、充当间谍和殖民侵略者帮凶的揭露与批判<sup>④</sup>,又如基于现代化和跨文化范式对郭士立办报、著述和译介等文化活动的研究。<sup>⑤</sup>

值得注意的是,两国学界都倾向于研究郭士立在某一特定方面的行动,并将与之相联系的某种身份(如传教士、侵略者或译者等)视为相对独立的常量,重行为而轻动机,较少有学者对郭士立复杂多样的身份角色做全面的梳理和动态的分析<sup>⑥</sup>,郭氏各种身份之间的关联与冲突更非学界关注的重点。然而,19世纪早期来华传教士多重身份的内在联系与矛盾所反映的,恰是他们当时所面临的在华宣教困境及其应对策略,是他们对中西交往范式的应答和意愿的改变。如费正清所言:“像大多数创业情况一样,人员和其他资源都严重不足,所以要求这些人比在后来的发展情况下担任更复杂得多的任务。除此之外,传教士要完成吸收信徒的这一主要任务仍然存在着种种障碍,所以早期多得不成比例的传教士

① Hartmut Walravens, *Karl Friedrich Neumann (1793-1870) und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1803-1851): zwei deutsche Chinakundige im 19. Jahrhundert*,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1.

② Thoralf Klein, Reinhard Zöllner (Hrsg.), *Karl Gützlaff (1803-1851) und das Christentum in Ostasien: ein Missionar zwischen den Kulturen*, Nettetal: Steyer Verlag, 2005.

③ 有关对郭士立传教活动及福汉会公案的论述,见吴义雄:《郭士立与福汉会》,载吴义雄:《开端与进展:华南近代基督教史论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4-71页。有关对郭士立医药传教策略的介绍与分析,见张琳:《郭士立的医药传教思想与实践》,载《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第16-19页。

④ 见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童轩:《历史不容篡改》,载《中国宗教》,2000年第5期,第40-45页;陈忠:《为英军侵华服务的德国传教士》,载《天风》,2002年第11期,第33页。

⑤ 在这方面,有许多针对郭士立文字创作和译介中文经典著作的研究成果。见熊月之:《郭实腊〈贸易通志〉简论》,载《史林》,2009年第3期,第62-67,189页;李海军、范武邱:《郭实腊对〈红楼梦〉的误读——论〈红楼梦〉在英语世界的首次译介》,载《山东外语教学》,2013年第3期,第100-103页;王燕:《十九世纪西方人视野中的〈三国演义〉——以郭实腊的〈三国志评论〉为中心》,载《中国文化研究》,2016年第4期,第155-166页。若统计对郭士立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的研究,则相关成果更多,这里不一一列举。

⑥ 陈虹:《郭实腊评传》,载《图书馆杂志》,2004年第5期,第72-75页。该文对郭士立的多重身份角色做了分析与对比,对各种身份与传教之间的关系虽有论述,但限于篇幅,并不深入。杨佳智:《郭实腊其人及其在早期对华传教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影响》,载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编:《传教运动与中国教会》,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86-130页。该文对郭士立的传教活动做了全景式的梳理与归纳,较为详细地列举了郭氏建构的多元身份以及与身份相关联的行为。